

柏杨白话版



司马光撰

柏杨译

资治通鉴

第一辑 秦风汉雨

战国时代
楚汉相争
黄老之治
宫廷斗争
吞并六国
匈奴崛起
开疆拓土
万里诛杀

北岳文艺出版社

資治通鑑

卷之九十四

宋史紀事本末

白话版



司马光撰

柏杨译

资治通鉴



第一辑 秦风汉雨
战国时代 吞并六国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一辑 秦风汉雨 / 司马光撰；柏杨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6

ISBN 7-5378-2901-2

I. 柏... II. ①司... ②柏... III. 中国—古代史—编年体
IV. 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4461 号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第一辑 秦风汉雨

司马光 撰

柏 杨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55.5 字数：140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901-2

I·2817 定价：98.00 元

凡 例

一、本书根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柏杨版《资治通鉴》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二版出版。

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书中部分内容作了下列技术处理：

1. 人名统一。如“公孙痤、公叔痤”正为“公叔痤”；“魏邈、魏遨”正为“魏邈”。

2. 地名校正。如“巫郡（四川省巫县）”正为“巫郡（重庆市巫山县）”；“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正为“武关（陕西省丹凤县东南）”；“白马津（河南省浚县）”正为“白马津（河南省滑县）”。

3. 汉语拼音校正。如“单于，音 dānyú [丹愉]”正为“单于，音 chányú [禅愉]”；“月氏（音 yuèshì [悦世]）”正为“月氏（音 Yuèzhī [悦支]）”。

4. 译名统一和校正。如“伊庇鲁士国王皮洛斯”正为“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塞琉卡斯王国”正为“塞琉西王国”。

5. 计量单位中的“公里、公分”均改为法定计量单位“千米、厘米”。

6. 年代表述。如“一九三〇年代后期”正为“二十世纪三〇年代后期”；“前四世纪〇〇—二〇年代”正为“前四世纪最初十年—二〇年代”。

7. 对原地图作了部分修改，如海岸线——用实线表示古海岸线，细虚线表示今海岸线。

8. 对原文中“中华”、“中国”、“蛮族”等表述作了适当修改，如涉及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文中，原文“中国”改为“汉朝”。

9. 还有个别其他方面的改动，不再一一列出。柏杨先生对于许多史实的评论，表示他个人独立的见解，我们尽量保持原貌，见仁见智，读者诸君自能明鉴。

《柏杨版资治通鉴》再版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我打从出生（一九二〇年？月？日）活到今天八十六岁，才领悟过来的话。

我的第二次出生——我一生有好几次惊涛骇浪、死去活来的经验——我自认第二次出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因文字贾祸，被捉进牢的这一天。直到一九七七年，坐足九年又二十六天，获释出狱。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入狱的那一天作为第二次的生日，理由很多，仅仅以《柏杨版资治通鉴》今年（二〇〇六年）在北岳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并与大陆读者见面一事来说，不但要归功于牢狱之灾，也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这场牢狱，我无论怎么摇笔杆，充其量也就像近日病危、闻名于世的美国包可华（Art Buchwald），只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坐牢九年又二十六天，使我潜心读史，开始我对中国绵长历史的爬梳工作，也建立我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我选择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作为我第二次的出生，理由岂不已足够？提携我最多的至友、更是我的良师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说过：“……若不是蒋关他个十年，他那派花言巧语还能说多久呢？……”（一九九九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柏杨思想

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德刚教授是主题演讲者。）唐教授这番话，实在是我一生的点题之笔。他甚至嘉许我这本《柏杨版资治通鉴》说：“柏杨，柏杨，这就是你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至友与良师这番话，我万分不敢当，但感激与惕励之心，确是我人生舞台中不绝于耳的支持与鼓掌。

语言是思想网络上的坐标。把距今九百余年前所完成的《资治通鉴》（公元一〇六七年，宋王朝第六任皇帝赵顼赐序给《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用我们这一代的语言——现代语文，把公元前四〇三年到公元九五九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几年的中国历史，重述一遍给读者听，除了语言的演化之外，我当然不能保持封建时代的思想价值标准。新的时代当然有新的坐标，所以在“臣光曰”之余，我有我的“柏杨曰”。这是我这一套译书一个很“自以为是”的特点。

今天我们进入信息发达的计算机时代，我们的社会也由绝对的单一信仰，进入到开放多元的时代。语言结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思维逻辑等等演化的速度，比过去要更快速。今天年轻的一代，在计算机的使用中不但出现新的语言，甚至发展出图像文字。在有变、有常的生命长河里，我相信历史是我们人类文化累积的资产，属于恒常不变的湍湍长流，语言文字表达却会随着时代而演变。我相信将来会有不同版本的《资治通鉴》出现，更有不同人物的史观评价，补充“臣光曰”和“柏杨曰”。

出版前夕，想到我自己一生的转折，祸与福相倚的吊诡，就要抛开目前流行的短线操作，而学用历史深邃的眼光来看待世事，《资治通鉴》正是一本宝典。

柏 杨

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于台北新店

柏杨序

我一直抱着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旧党），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

战国时代	前四八〇—前二二一年
三国时代	二二〇—二八〇年
大分裂时代	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时代	九〇七—九五九年

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的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

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过出现圣君贤相。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

《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的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启示。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因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发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个字母，以两年余的时间，全部出齐。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并幸运的获得空前成功。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但我们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

一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这篇序文写于第一册完稿之后，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把死文字变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有时比新的创作，还要困难。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没有主词，往往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典故堆砌，意义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译，全都费尽思考。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进一步。而彻底解决，时间又不允许——有些问题可能要聚讼累年。但我仍继续下去，孜孜不息，竭尽全力。

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

柏杨再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开始问世时，曾经写一篇“序”。而今，一九九三年三月，当七十二册平装本，改成三十六册精装本发行时，再提笔写这篇“再序”。二“序”之间的距离，在书本上不过只差一页，但在时间上却差十年。

这十年对全世界而言，是一场巨变。执笔之初电脑还是一个神话，于写到尾声时，它已完全进入人们生活。而在台湾，执笔之初对警备司令部和调查局，还心存惊恐，于写到尾声时，人们已开始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巨变影响面之大和影响程度之深，过去从没有过。在发生之前，也从没有人认为它会发生。

直接影响翻译工作的是：执笔之初台湾海峡还不能逾越，于写到尾声时，两岸已交流频繁。执笔之初我们所用的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地图，于写到尾声时，已可公开使用大陆地名。以致，我们的后续工作，比其他巨著的后续工作，加倍复杂。

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资治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之前。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于台北

赵頊序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书经》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的全神贯注。”《诗经》、《书经》、《春秋》，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西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再根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广为收集，精密选择，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再加以考证，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于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发现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内容分成“纪”“表”“世家”“书”“传”五个单元，遂成为定型，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司马迁主要的优点，在于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赞扬和谴责，也都十分中肯。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迹，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搜集资料，由政府供

应全部经费。起自公元前四〇三年，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陵替，皇族衰弱，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东迁到洛阳，齐、楚、秦、晋，诸封国才开始强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后成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用以号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陪臣）韩、赵、魏三家，当封国国君（诸侯），周王朝虽未灭亡，纲纪却已全毁。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威信盛衰的基础，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将领们的战略，官吏们的施政方案，严格的分析它们是邪恶？还是公正？是长久之计？还是只顾眼前？不仅于此而已，连词藻美丽的文章，含理至深的议论，也都一一收集。历经十六个王朝，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广博而扼要，简洁而不遗漏。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文章词藻的选辑。荀况曾说过：“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像西汉王朝的刘恒（五任帝）、刘询（十任帝），唐王朝的李世民（二任帝），都是孔丘所说的，无可挑剔的人物。其他的英明君王，或有诚挚的爱心，或有忠孝的感召，或者知人善任，或者勤俭谨慎，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孟轲说：“我对于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至于有的荒谬狂悖，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有的恶毒奸诈，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诗经》说：“商王朝子孙，应以夏王朝的覆亡，作为借镜，不必远求。”所以，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显示我的盼望。

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皇上召大臣讲课，我奉到圣旨，宣读《资治通鉴》。该月九日，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皇上把御制的序文，当面赐下，吩咐：“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

柏杨注：后一段是司马光先生注。

司马光进呈《资治通鉴》表

臣司马光言：

先前，接奉圣旨，要我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不久，再接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现在，全书已完全定稿。我性情愚昧而且鲁莽，学术更是荒疏，所做的事，都在别人之下。惟独对于历史，心有所爱，从幼到老，嗜好不倦。深深的感觉到，自从司马迁、班固以来，史籍越来越多，普通人有的是时间，还读不完，更何况高高在上的君王，日理万机，哪有闲暇？我常怀一种抱负，打算加以整理，删除多余的废话，摘取其中的精华，专门收集有关国家兴衰，人民悲欢，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的政治行为，编著一部编年史。使先后顺序，明确呈现，内容篇幅，繁简适当。只因为私人力量单薄，无法着手。幸而遇到英宗皇帝（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聪明睿智，关心文化推展，想了解古时政事，借此作为制定国家大计方针的根据。特地下令，教我着手编纂。往日的愿望，忽然可以发挥，欢欣鼓舞，不能自己。惟一恐惧的是，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先帝（五任帝赵宗实）又命我自己物色任用助手，在崇文院内，设立编辑局，准许向龙图阁、天章阁、“三馆”（昭文馆、集贤馆、国史馆）以及秘阁等图书馆，借用图书。并发给御用的笔墨纸砚，更特别